八十年代看过来

□陈祖芬

那是一个需要人才而且产生人才的时代。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本身。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的使然。

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察看八十年代的电报、发票、证券、海报，八十年代中后期电话月租费相当于3套住房月租费的交费单据，邓伟当年拍文化名人一天6毛钱租相机的发票。1980年解冻后封皮上写着“内部参考资料”的《魂断蓝桥》剧本，1991年买麻酱粉丝还必须带上的居民购货证。乃至邓小平追悼会的请柬，作者贴的一本悼念周总理的剪报等等。尤其是很多的名人书信！我觉得时光倒流激情涌动，面对八十年代的实物秀，感动于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丰厚！

八十年代，不是我不明白，那世界变化快。看过来，看过来，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把八十年代看过来。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我天天夜间从东单走到天安门，正是三九天，泪水滴在地上就是冰。当时天安门的地上铺了一层泪冰。我每天午夜从天安门走回东单，痛苦不堪！于是拿起笔来开始写诗。那年大地震，我家那楼是危房，用绳子围起不让人再进去。我偷着溜进去一次，取出了一件的确凉衬衫，那是我妈给我买了布让裁缝做的。是我最好的衣服。不过我不会为这件衬衫冒生命的危险，我是为了取出那一叠写总理的诗。于我，这是我那房子里最珍贵的。我没有想到这些诗句后来会发表会演出。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可以说，我只用心写过三首诗，1976年四人帮肆虐写周总理，2003年非典肆虐写《天使不相信眼泪》 2008年地震肆虐写《中国不哭》。

2008年7月23日，报载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第一套“纯黄金周恩来金币”正式发行。这是2008年的纪念方式了。

1978年12月23日，安徽凤阳的18户农人，齐齐按下手印，悄悄地开始了后来席卷中国的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扩大增派出国留学人员。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此文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解放日报》新华社通稿刊登震撼全国。

1978年2月，北京大学恢复高考后首批大学生开学。

1978年第1期《红小兵报》上，有了赵朴初、蒋孔阳、王运熙的文章。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讲到派留学生时说，要成千上万地派。

2008年7月4日《今晚报》报道，改革开放30年来121万中国学子遍布100多个国家。

1979：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拥抱和接吻吗？

1979年《大众电影》作为当时惟一一本有彩页的娱乐杂志，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一个读者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一诘问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197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本报讯：东北三省和华东五省市协商解决工人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

1979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新华社上海电：《理直气壮地实行奖金制度》。

1979年6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放的鲜花》。

1979年春，皮尔·卡丹带着12名外籍模特，在京城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中国大陆破天荒的时装表演，虽然只是内部观摩。

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读书无禁区》一文发表。

1979年的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在1966年全国报纸禁止刊登商品广告后，第一家登出了广告。

1980年《北京晚报》副刊，巴金、丁玲、冰心……等名家出现在晚报头版。

1980年，深圳第一家乐家家俬厂在全市有了知名度，不仅因为是第一家家具厂，而且因为象香港那样把家具叫家俬。

1980年3月，中国有了第一份面对信息业的《计算机世界》。同年美国的苹果公司已经身价12亿美元。

1980年6月，第4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在意大利举行。中国的五星红旗在比赛场地升起来了！中国得了男女体操团体冠军！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电影《魂断蓝桥》作为“内部参考资料”解冻。

198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刊物《未定稿》 发表了《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

1980年10月初，北京医院412病房。赵丹临终前，对前来探望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说及党不要管（文艺）得太具体等。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5版头条发表赵丹的临终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后来，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中讲到赵丹，“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1981年元月12日，茅盾写下短文：《欢迎＜文学报＞的创刊》。

1981年1月号的杂志《作品》，封面的大头像，从领袖像变成了农民。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油画《父亲》，作者：罗中立。后来，罗中立的儿子罗丹，成为“80后”的潜力股画家。他的《摇滚青年》系列，“几乎脱离了父亲对我的影响”。

1981年，袁庚在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1年，“托福”引进国门，自费留学放开。

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七战全胜，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中夺冠。举国高呼：振兴中华。

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

1982年3月成立国家体改委，总理兼任主任。

1982年9月28日《北京晚报》头版头条：《北京皮鞋市场一扫‘一色黑’现象》。

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李宁获6块金牌。后来，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李宁又是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

1983年夏，马明哲任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1988年春，马明哲任平安保险的总经理。

1983年，王石知道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来到了深圳创业。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答辩。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共15名候选人回答了选民的提问。

1984年5月15日《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

1984年，充满了挑战与机会。

福建农村有一个孩子外号“弹弓大王”，他到安徽后给一个中学老师看中，1984年进了国射击集训队，1984年7月29日11点10分弹弓大王许海峰连中十环，拿下了第23届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新的一页。

写电视剧的人，也不能不面临《霍元甲》的挑战。只要电视播演《霍元甲》，胡同里就没人了。电视一演完，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就爆满。

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海峡两岸的运动员，手握在了一起。

1984年10月1日，游行队伍打出了一条标语：“小平您好！”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过“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

1984年4月，山东省牟平县西关大队，350户社员有240多户装上了电话。1989年装电话的时候，安装费400元。两三年后涨到5000元。

2008年7月23日《参考消息》发表德国《明星》周刊文章：1990年每100个中国人里只有1人有电话，如今这个数字已经变成64人——而且不包括有手机的人。

1984年，沈昌文第一次看到XO，以为是黄酒。沈昌文84年去香港，第一次见到颜色黄的XO，以为总是上海的黄酒一类，就傻傻地喝了3杯，当即醉倒。84年往后20年，2004年，谁还不知XO？XO这个词和X光照片一样烂熟于人心。怪不得报载有人讲到运动员赵蕊蕊的伤势，说雅典奥运会是不能上场了。但她照了XO了，没什么大问题。说这话的人自然年轻。年轻人当然熟悉XO而不熟悉X光。

1984年，8岁的孙佳星唱响《聪明的一休》主题歌。

1984年第5期的《读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诗句：“世界在倒废纸篓、倒掉了种种旧概念。”

1984年，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被几家中国出版社译成中文出版，在中国的知识界和高层引起轰动。

198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篇题为《解大胆》的报道，写到河北逐鹿县委书记“解大胆”大声疾呼：‘禁得多不合国情，管得死不符合民意，要富民必须排卡除障。’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京签署，预示了香港的前景。

沈阳的一位改革家被谋杀了。这是那段时间里的第几个了？1984年的七十一号文件是为保护改革家而发下的。厂长、经理的家里、办公室里安上了警铃。不安警铃也行，或许当烈士，不过这是下策。

1984年上海市集体办地区工业管理经营部对全市地区工业26万职工住宅情况的调查表明：人均居住面积在1.7平方米以下的就有25700户。结婚无房户达28948户，三代同堂特困户15544户。静安区集管局19521名职工，各类困难户、无房户达6892户，其中全家居住在高1.8米以下的阁楼的有209户。

1985年初，我国最“洋气”的城市上海的某中学。五个初中一年级的女生，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深达一米的积水，无法走过去。同班的五个男同学，学雷锋把五个女生背过积水地。事情传开，老师要他们交待是否乱搞男女关系。五个女生写了遗书集体自杀，亏得被及时发现，没有丧生。85年10月，山西一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正要办喜事，觉得似已怀孕。婚前（或者说是提前）与爱人有关系，舆论难容。她找到一个既无电源，又无医疗设备，更不消毒的个体诊所刮宫。把肠子都刮出来了，也未见有胎儿组织，直至活活给刮死！

2008年6月24日凤凰台《有报天天读》栏目，杨锦麟讲到北京有5000家性商店，中国人民真的崛起来了。

1985年12月27日，《中国报刊》文章：《孙超，他闯出民间外贸新路》。1986年10月27日，《世界经济导报》的文章：《应该怎样认识“孙超现象”》。2008年5月14日新华网首页报道：孙超 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民营外贸经济的先驱者。

1981年至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城镇建成新住宅6.48亿平方米，约相当于建国开始到1980年住宅建设的总和，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十平方米；农村新建住宅32亿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4平方米。

1985年7月4日，北京市政府在石景山当众焚烧了价值九万元的福建省晋江地区以及某部队非法药厂等生产的伪劣药品。上海钟表公司初步统计，冒充 上海”、“宝石花”等牌子的手表已达二百五十万只左右。

商品经济必然带来信息流。于是就出现了信息骗子。黑龙江数千农民买进以玛瑙螺假冒的蜗牛养殖。结果有的欠债累累，有的倾家荡产。

没有哪一种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同时，不带来这样那样的弊病。

1985年，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查”留学大门大开。

1986，世界和平年，崔健唱响一曲摇滚：《一无所有》。

1986年1月4日《文汇读书周报》报道，我国目前出版的报纸已达1632种。全国性报纸57种，地方综合性报纸413种，早晚报23种，科技报88种。

1986年1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之前和之后，邓小平9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深得人心！

1986年，中国女排在世界大赛中五连冠。

1986年两个中学生的对话：

“我把一个银行存美国了”。一个北京中学生在吹牛。

“我把美国存银行了。 另一个中学生立刻就盖过了他。

也许在1986年的中国才能听到这样有思想解放度和经济活跃度的戏言。

1987年3月，《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北京长城风雨衣厂厂长张浩世，从5年前他组合一些缝纫合作社到5年后“长城”风雨衣占全国风雨衣半壁江山，然而张浩世没有一件风雨衣。

但我希望，风雨衣厂长也有风雨衣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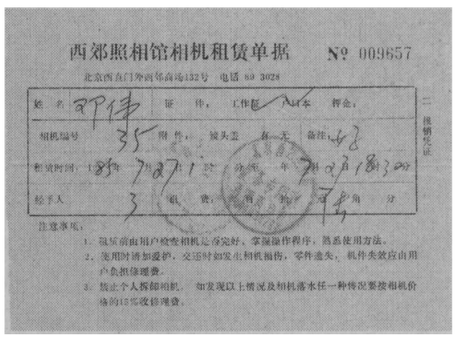
1987年4月，邓小平说：“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

1987年9月5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提出：不要再谈以计划经济为主了。

1988年3月24日《北京日报》头版：《赵紫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客人时说：中国当前任务是消灭贫困和落后》。

到1988年5月， 我的书柜衣柜还都是文革遗风。那时全体衣柜都是右边的木门上方，有一方玻璃，玻璃后拉着一方很土的绿丝绸。直到5月我搬家时才告别了这只衣柜，只带走那方丝绸，梦溪给我理发时，我好用来围在脖颈上。搬到新家也照样只能在洗脸盆里洗澡——用洗脸盆里的水往身上泼。那时北京新建的居民区，譬如劲松，一般都是两平米的洗手间，一概没有洗澡设备的。不过20年前，我们大家不洗澡。



邓伟当年拍文化名人一天6毛钱租相机的发票



电话月租费、房屋租金收据

定于1997年2月25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请届时参加。

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

1997年2月22日

邓小平追悼会的请柬

随想录

唤醒听觉

——读路文彬《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

□耿 娴

20世纪被本雅明形象地称做机器复制时代。照相术、电影、广告等视觉艺术形式铺天盖地而来，刺激着人类的视网膜，把人类的视神经能力发挥到极致从而制造出一个个麻木的表情。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人类对艺术的理解，更深刻地置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视觉快感的产生和消失以无比夸张的姿态凸显着现代性对时间的焦虑。于是，流行元素的更迭、价值大小的评判正在被我们的眼睛说了算。孰不知“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语还在承认着眼睛的受控地位，而现代性的来临则直接赋予“眼见为实”的绝对权力。现代性给我们一次次带来惊讶的逼真，这种逼真正以其不可置疑的霸权把我们送上了远离真理的快车。康德选择把审美作为沟通理性和自由的通道。视觉文化以大众文化消费性的姿态摒除了我们个性审美的必要，也切断了我们走向自由的可能。我们的审美能力如何在视觉文化的凝视下陷入了失语？我们一直渴望的自由为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遥不可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路文彬先生在他的新著《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中表达了深沉的焦虑和思考。

作者所指的视觉文化并不全然指向影像范畴的视觉关注。而是分析人类长期以来对视觉的过分依赖导致认知能力、情感方式、价值评判出现的伦理维度的问题，并从听觉角度试图找到一种有效途径来弥补如上缺失。本书作者首先廓清了视听作为我们认知世界的两大知觉，听觉一直受到压抑。作者以科学的态度，从生理学角度分析了听觉先于视觉存在，它是我们最初和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知觉。

进而作者从伦理学角度，将听觉和情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一勾连。听觉诉诸宁静，诉诸服从和情感。宁静生发出的“空”和“静” 指向了“自由而又超越的时间性”。这就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带给人的空灵美。服从不是片面的听从，而是一种归属。“不是去占有一个陌生的世界，而是想回到其曾经拥有过的熟悉场域，是对自我情感记忆的寻找。”贪婪的目光把人引向无限追逐的下一个目标，一次次把我们带向远离我们自身的地方。而倾听表达的是一种牵挂，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我们的礼乐文化，将倾听纳入到秩序的建构中。乃是因为音乐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刘小枫称此为“主要用于消除内部和外部刺激造成的张力，以求得心态的平衡快适”。在这种快适中，中国人建构了君臣父子的秩序。并且有了孔子关于情义之抉择中就“情”去“义”的伦理维度。道家确立的美学原则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一与视觉决然分离的美学原则完全诉诸内心情感的体悟。这就是我们的传统艺术为什么是注重意境的和写意的，成为今天西方艺术反思自身发展的参照。

在这本关于听觉伦理的书中，作者对当前文学作品中伦理失衡的诸多现象表现出一个学者高度的责任感。现代性的躁动不安让中国文学出现了“失聪”。一个好的说者，必定是好的倾听者。只有照顾到倾听者的情绪，说者才能更有效地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对话才能构成。对话必须随时准备着耐心的倾听。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观点，令人不禁深思拍案：倾听者才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

领悟此，我们反观五四文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郁情结充斥在作品中乃是因为启蒙者缺少或不屑于倾听。他们充满着焦虑，一味批判祥林嫂、孔已己、阿Q、祥子等身上的国民性弱点，而没有俯下身来倾听他们这些弱者的声音。这就让我们深思倾听者不在场的国民性批判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启蒙者原本就是视觉中心主义者，他们在意识到文学和大众之隔膜的同时没有反身自顾本身的缺陷。因而我们在读到《伤逝》就会发现，五四时期的爱情同样因为缺少倾听，而忽视了女性本身的需要，只一味陷入到男性所需要的生存、发展的开拓事业中。男性中心主义也如此这般建构起来。作者担心女性在争取自身的权利，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时候，会遭遇到同质化的威胁。因为她们躲避了对话，选择了对抗，同男性争夺外在世界一样，来夺回失掉的利益。这种过程正好见证着男性中心霸权的存在和牢固，而不是建构一种和谐共赢的局面。倾听的不在场，也让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陷入集体主义和个性的对抗中，压抑了个体正当利益的诉求。

听觉正待被唤醒。它是我们的心灵和世界进行沟通的另一扇门，需要与视觉一道引领我们走向未知的领域。我们需要耐心地聆听这个世界，这是人类的本源、旨归和诗意地栖居的地方。让我们默诵本书作者题记里引用的里尔克的诗句：“却从最隐秘的欲望中找到庇护之所，/带有一个入口，还有颤抖的廊柱，——/你建造起一座神庙在它们的听觉深处。”

新书博览